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國際問題座談會：美國亞太政策的新趨勢

doi:10.30390/ISC.198304\_22(7).0004

問題與研究, 22(7), 1983

Wenti Yu Yanjiu, 22(7), 1983

作者/Author：國際組

頁數/Page： 11-3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國際問題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組

- 一、討論主題：美國亞太政策的新趨勢
- 二、時間：七十二年四月一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卅分
- 三、地點：本中心一樓簡報室
- 四、出席人員：

##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 李本京先生：淡江大學研究院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  
李鍾桂女士：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邵玉銘先生：亞洲與世界社主任  
金神保先生：政大外交研究所教授  
孫震先生：經建會副主任委員  
張德光先生：美國博爾爾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曹俊漢先生：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 陳水達先生：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陳明先生：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  
陳長文先生：政大法律系教授  
楊達泰先生：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  
葛敦華先生：總統府戰略顧問

## (二)本中心參加人員：

- 張京育先生 尹慶耀先生 陳鴻瑜先生 陳元先生  
周煦先生 區鉅龍先生 鄒雲亭先生 畢英賢先生  
沈劍虹先生 羅石圃先生 朱松柏先生 李登科先生  
張隆義先生

## 五、主席(周煦先生)報告：

主任、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們爲了慶祝本中心成立三十週年而舉行這次國際問題座談會。首先我要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來參加。座談會的主題是「美國亞太政策的新趨勢」，下分七個子題，每一子題都由一位先生來擔任引言人，其中第六個子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因引言人臨時有事，無法交稿，好在在座的孫震先生是著名的經濟專家，

一定會給我們提出高見。今天的討論雖然列有七個子題，我們除了歡迎各位就這一範圍踴躍發言外，也歡迎就子題以外有關美國亞太政策部份，提供高見，現在我們先進行引言人報告。

#### 六、引言報告：

##### (一)區鉅龍先生：亞太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

亞洲與太平洋地區擁有世界最遼闊的陸地和海洋，衆多的人口，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重要戰略位置。英國戰略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指出，誰能掌握歐亞大陸（Eurasian Land Mass），誰就能控制世界。美國軍事家馬漢海軍上將（Admiral Alfred Mahan）也曾強調，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爭霸世界。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戰略家史派克曼（Nicolas Sykman）也曾主張美國必須掌握北大西洋及太平洋，以確保美國的安全和利益。雖然今日我們已進入核子飛彈的時代，但他們三位「陸權論」和「海權論」並未因此被否定。相反的，今日美蘇兩大超級強國在亞太地區正展開針鋒相對的軍事、外交、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或明或暗的鬭爭。許多西方人士也一致認為亞太地區將註定今後國際政治的發展和動向，他們肯定八十年代將是亞太地區的年代。

有些人則認為亞太地區是世界最具爆炸性的地區，不僅美蘇兩國在該地區正展開軍事戰略部署的競賽，同時許多亞太地區國家本身正處於微妙的政治、社會及經濟變遷過渡時期。強權政治鬭爭的方興未艾構成了亞太地區緊張不安的外在環境，無論大小國家皆直接或間接被滲入了美蘇在該地區的對抗。

另有一批人則認為亞太地區的前途是樂觀的，他們特別提到亞太地區過去十年來的經濟和貿易成長，民主政治的穩定發展，和亞太國家之間與日俱增的「地區認同」和地區性合作。例如自從一九七三年世界石油危機以來，當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遭遇嚴重經濟衰退時，唯獨亞太地區國家仍能一直保持經濟成長，該地區與美國的貿易額也迎頭趕上西歐與美國的總貿易量。他們甚至認為，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已經為亞太地區免除了卅多年來軍事與政治緊張的重要因素。當然，這種樂觀看法未免言之過早。事實證明華盛頓與北平關係正常化之後，亞太地區出現了許多新的緊張和衝突，例如美蘇之間、日蘇之間、東協國家與共黨越南之間的緊張關係，就是明顯的事實。而中共對臺灣的威脅，以及北韓對南韓的野心不僅未曾稍減，反而與日俱增，對東北亞地區的安定繁榮構成重大的危害。

美國自二次大戰結束後，躍身成為世界強國，同時取代了西方殖民地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地位，號稱亞太強國。亞太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是多層面的，美國在該地區所追求的利益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1)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優勢；(2)謀求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3)促進亞太地區非共國家民主憲政的發展和穩固；(4)鼓勵亞太國家間之地區性經濟合作；(5)維護亞太地區自由貿易的發展和成長；(6)健全亞太地區投資環境等。

為達到上述多項目標，美國在亞太地區採取了多種不同的軍事、經濟、外交及文教等措施。軍事措施包括雙邊和多邊安全聯盟條約，如中美防禦條約，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安保條約，美菲防禦條約，美、澳、紐三邊聯防公約，馬尼拉公約，東南亞組織條約等一系列軍事安全措施，層層圍堵共黨，阻其向亞太地區伸張勢力。經濟措施則包括提供經援和貸款，促進該地區農商企業之發展，鼓勵美商投資及加速工商科技轉移等。美國在基本上認為，亞太諸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及內政修明，才是阻止共黨滲透顛覆活動最佳保障。美國提供軍事保護傘，主要也為亞太非共國家爭取時間從事內部各項建設。在外交措施上，美國一方面謀求透過外交途徑減少美國與亞太國家間既存的和潛在的衝突，另一方面則尋求鞏固美國與亞太盟國及友邦的共同政治利益。同時美國運用其外交影響力，期能促使亞太各國邁向政治民主化的目標。文教措施方面，美國透過各種文教機構及基金會，擴大美國與亞太國家及亞太國家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同時鼓勵及加強美國學術界研究亞太問題。當前美國不僅擁有不少頗具水準及教學設備完善的亞太研究學術機構，同時也培養了許多研究亞太問題的優秀人才。事實上，美國在研究亞太問題方面已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國家。這一成就當然反映了美國重視亞太地區的程度。同時亞太地區留美學生數目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從美國的文教觀點而言，亞太地區青年在美國接受教育，體念民主政治的本質，當有助於加強亞太非共國家憲政的發展和親美的立場，進而增進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長遠利益。

以上顯示，美國不僅重視亞太地區，同時美國也有一套促進它在亞太地區軍事、外交、經濟及文教等利益的政策工具。在美國國力強盛時期，美國大致都能順利追求上述利益，無論一般美國民衆，或大眾傳播界、學術界、國會、利益團體等各階層人士，都一致支持美國在亞太地區採取高姿態軍事與外交措施。杜魯門的圍堵政策，艾森豪的集體安全防衛體制，甘迺迪的實力政策，都能獲得美國朝野上下的諒解和支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越地位也因而得以確保。在強盛的軍經力量和朝野共同的「政治認同」基礎上，美國在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期間的亞太政策發揮了積極主動的作風。尤其在軍事優勢上，這段時期堪稱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壓倒性頂峯時期。當然，當前美國基本上仍然是亞太之雄。不過，越戰之後，美國似乎已逐漸失去早期主動的政策活力。回顧二次大戰結束初期，尤其是在東西方兩敵對陣營進入「冷戰」階段，以及國際共黨運動呈現一元化本質的時候，美國曾有信心和決心在亞太地區主動推動和製造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形勢。然而時至今日，美國的亞太政策不但如往昔的主動積極，而且被動的成份比較多。尤其是在中共與蘇俄雙方衝突升高和具體化之後，美國顯然已經缺乏明確固定的亞太政策。華盛頓「聯匪制俄」的構想，未見其利而已見其弊。其中最明顯的弊端，即是美國戰後在亞太地區所煞費苦心建立的地區性安全集體制逐一瓦解。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消失、東南亞公約集體安全組織的解體、越南及中南半島的悉遭赤化等，使得亞太地區軍事形勢愈加複雜和不穩。

在過去短短十年期間，美國的亞太政策呈現了搖擺不定甚至零亂的步驟。尼克森時代所宣佈的「關島主義」，主張亞洲事務

「亞洲化」，同時希望建立以美國、蘇聯、中共及日本爲主的「四角關係」，謀求在亞太地區建立「勢力均衡」的局面。但是到了卡特時代，美國爲了懲罰蘇軍侵入阿富汗的行爲，又採取「聯匪制俄」的「反蘇」統一陣線，同時宣佈美國將售賣武器給中共，並加強與中共的所謂「平行戰略利益」。卡特一面倒向中共的作風，以及他強調「人權外交」的作法，不但使得美蘇關係益形緊急，也一度使許多亞太非共國家產生不快。美國的可靠性在許多亞太國家的心目中也因此因而大打折扣。這段時期，可稱爲美國與亞太國家關係最低落的時期。

目前雷根政府的亞太政策大體上仍未完全擺脫尼克森「關島主義」的基本精神和卡特「聯匪制俄」的「反蘇」統一陣線。所不同者，雷根政府認爲美國唯有重振它在亞太地區傳統的軍事和外交優勢，才合乎美國及其亞太盟邦和友邦的共同利益。因此，雷根的亞太政策本質上是「混合性」的戰略政策。它一方面繼承了尼克森「勢力均衡」的目標和卡特「聯匪制俄」的構想，另一方面則強調「實力外交」的功效。雷根同時一再向亞太非共國家保證，美國在與中共促進正常化時，將不採取任何有損這些國家利益的行動。尤有進者，雷根對共產主義的深切認識和他反共的道德勇氣，已經普遍在亞太自由國家獲得讚賞。無容諱言的，在過去二年多中，雷根政府已經改善了美國在亞太自由國家心目中的形象。

不過，由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愈來愈複雜，白宮本身並非唯一的決策機構，同時國會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因此，雷根未來的繼承者是否將延續當前美國的亞太政策，甚值吾人注意。

#### (二) 李登科先生：美國對亞太地區自由國家基本政策的新動向

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對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地位以及對美國本身的經濟利益，都十分重要。就美國的全球戰略而言，如果亞太地區的自由國家不能與美國携手合作，美國在這一地區就將難以有效地與蘇聯或其它敵對者對抗。理由很明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軍事基地，除關島以外，可說都位於這些自由國家的領土內；倘若美國對這些基地的使用權發生問題，美國當然無法在亞太地區維持強大的武力，而蘇聯的勢力便可長驅直入；一旦亞太地區的自由國家淪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或採中立政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就要一落千丈，太平洋也將不再對美國「太平」了。

就經濟利益來說，亞太地區自由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額已超越美國與西歐之間的貿易，而成爲美國最大的貿易地區。以一九八一年爲例，美國與亞太地區自由國家的貿易總額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如包括澳洲與紐西蘭則爲一千三百六十億美元）。這項貿易總額，再加上美國在這些國家中的投資以及東南亞地區所擁有的豐富天然資源，應足以說明美國與亞太地區自由國家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

自雷根總統就任以來，美國對亞太地區自由國家的重視確實超過卡特政府時期。譬如雷根政府不但增加對大韓國民的軍事援助，也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等國增加軍經援助。另一方面，雷根政府不僅與這些國家的領袖保持良好的關係，並

且也經常派美國高級政府官員到這些地區訪問。此外，美國也進一步擴大與大韓民國、泰國等國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一切無不顯示雷根政府的重視亞太地區。

在海格未去職之前，雷根政府對亞太地區的外交策略似乎是以日本及中共為主。其它自由國家為輔。在安全政策上也採取類似的立場。但是中共對美國的百般刁難以及不可信賴性，却讓美國頭疼不已。例如，中共不但拒絕支持美國對波蘭的政策，而且抨擊美國的中東政策、南非政策與中南美洲政策；只有在阿富汗與柬埔寨兩個問題上，與美國的立場比較一致，這是因為蘇聯在阿富汗及東南亞的擴張，也深深影響到中共本身利益的緣故。

總之，由於中共的專橫加上「中國牌」的不可靠性，美國似乎決定重估對亞太地區自由國家的政策。根據雷根政府的官方文件以及其它有關的報導，美國目前對亞太地區的政策約如下述：第一、在東北亞方面，強化美國與日、韓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以三國的力量共同遏阻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張。第二、在東南亞方面，與東南亞國協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合作關係，以共同對抗蘇聯和越南對這一地區的威脅。第三、在可能的情況下，希望中共與美國及其它亞太地區的自由國家一起對抗蘇聯的威脅，美國的原則是，美國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對雙方都有利，因此希望中共採取自制的立場與美國發展關係。第四、在軍力配置方面，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將以海空軍為主，陸軍為輔，同時美國希望日本能承擔較以往為大的安全任務，包括保護距日本本土一千哩以內的海上運輸路線。

與一九七九年以後的卡特政府相比較，目前雷根在亞太地區的策略顯然是更加重視這一地區的自由國家。卡特政府是以美、日、中共三邊關係為主，東南亞國協為輔來對抗蘇聯的威脅，雷根政府則以美、日、韓與東南亞國協為主，中共為輔。中共地位的轉變是最大的區別。以上是個人的一些淺見，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踴躍發言。

### （三）陳鴻瑜先生：美國對亞太地區共黨政權的「和解」趨勢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出現了二個鬆散的國家集團，一是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包括日本、南韓、東協五國、中華民國、澳洲、紐西蘭、巴基斯坦，甚至中共；一是以蘇俄為首的集團，包括蒙古、北韓、越南、高棉、寮國、阿富汗和印度。這二個集團內部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矛盾和緊張性，二個集團的關係也是流動易變的，譬如在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中共即是屬於與美國對立的蘇俄集團的一員。二個集團之間也處於戰略對抗的緊張關係中。

從戰略觀點而言，義蘇二個集團的對抗關係，是建立在「包圍」和「反包圍」的考慮之基礎上，任何一個集團都想透過集團聯盟的力量逐步「包圍」對方集團，以縮小對方的活動空間。美國於一九四五—五〇年在西歐發展的「圍堵」政策，自一九五〇年後，也透過與亞洲國家的一些雙邊和多邊條約，而在亞洲逐步施行。美國在亞洲進行「圍堵」政策的有關條約有七種：(1)一九五一年八月卅日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2)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美、澳、紐安全條約；(3)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的美日安保條約；

(4)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5)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的美、澳、紐、法、巴、非、泰、英的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及與高、寮、南越的議定書；(6)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的美、澳、紐、法、巴、非、泰、英的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7) 一九五五年的美國、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英國的「巴格達公約」。除了這些條約外，還有一些協定、決議案、主義和宣言，如一九五五年艾森豪宣佈的「臺灣決議案」，一九五七年有關中東的「艾森豪主義」，一九六二年有關泰國的「魯斯克·他納 (Thanat Khoman) 協定」，一九六四年詹森宣佈的「東京灣決議案」、一九六九年七月的「尼克森關島宣言」等。

然而，直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美國纔開始覺察到她的軍力是有限的，並且認識到美國除了團結傳統的盟國以外，還必須與其他國家聯合。在這種戰略考慮下，美國企圖利用中共的力量來扼阻蘇俄勢力席捲整個東亞，以保障美國本土的安全。為遂行這項戰略原則，美國從一九七一年開始進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工作，如一九七一年派兵乓球隊訪問中共，季辛吉密訪中國大陸；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共，雙方發表「上海公報」；一九七九年元旦正式建交。從美國這種戰略態勢的改變可以看出，美國已經放棄了一九五〇年代所實施的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圍堵」政策，而其與中共進行戰略合作關係，顯然是以「權力平衡」為考慮的出發點，而降低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本文想略述美國對亞太地區的中共、越南、寮國和北韓四個共黨政權的新「和解」政策及趨勢。

首先，要說明美國與中共的「和解」關係。在戰略上，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已邁出第一步，但此種關係進展的速度和程度還要看各種變數而定，如蘇俄的行動、中共的政策及中共與美國集團國家的關係。我們可以把阻礙美國與中共關係的障礙，分為二類：第一類是政治問題，包括中共對臺灣的政策、美國對中華民國的軍售問題、中蘇共「和解」的程度，以及美國和中共對於以色列、南非、朝鮮半島等敏感性國際問題的看法。第二類是經濟問題，包括中共紡織品輸美限額、一般貿易、美國移轉高級科技給中共等問題。此外，還有個別爭執，如中共網球選手胡娜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令中共賠償前清政府湖廣鐵路債務。

一九八一年六月，美國前國務卿海格訪問北平三天，宣佈美國將放寬出售非軍事和軍事配備給中共的限制。然而在過去的一年多裏，雙方却為了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而發生公開的爭執。雙方還舉行深入會談，最後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發表聯合公報。美國在公報中保證，將在某段時期內，逐漸減少向中華民國進行軍火貿易，而中共也重申它的基本政策，是要「和平統一」臺灣。雖然美國已經核准一百多家美國公司賣軍火給中共，海格也曾對中共官員表示，美國將加速批准中共所申請採購的先進科技設備；不過，美國國防部仍禁止了其中一些交易，而且嚴格規定必須經過跟輸出蘇俄的科技設備一樣的檢查手續。這種做法頗令中共不滿，以致到目前為止，中共尚未採購任何美國軍火配備。

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美國國務卿舒茲訪問北平，與中共「國防部長」張愛萍舉行會議，討論了雙方軍官互訪、軍事顧問以

及加強軍事聯繫的問題。次日，集方又舉行會議，擴大討論兩國在軍事教育、軍用藥品和後勤方面的合作關係。會中決議美國將與中共「國防部」和「外交部」各設一個小組，專門探討雙方的軍事問題，研究加強雙方軍用醫藥和軍事專業人才訓練合作的可能性。據稱，在這次會談中，雙方同意擬訂一個可供未來雙邊軍事會談的議程，唯未說明會談舉行的日期。

儘管美中（共）在戰略上謀求採取一致的步調，但最感棘手的问题是雙方對地緣政治的判斷、計畫和戰術上仍有歧見。美中（共）雙方各自認為本身應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什麼角色？到底雙方的觀點是否和諧？都是很大的疑問。誠如季辛吉的批評：「在戰術方面，兩國難免會有一些歧見。在發展中世界方面，北平往往吸引一些激進派的支持，並且依賴他們的力量跟莫斯科競爭，而導致美國所支持的一些領袖和事業受到傷害，這並不是美國所喜歡的。同樣地，中共也對美蘇關係發生猜疑，它公開表示擔心『和解』會破壞西方國家的決心，使西方國家不願站起來與蘇俄對抗；在私底下，中共則暗中懷疑這可能導致美國和蘇俄進行一些安排，而把中共犧牲了。」

其次，要說明美國與越南的「和解」關係。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南北越統一後，美越雙方即在進行「關係正常化」的工作。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六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宣佈美國原則上準備與越南進行「關係正常化」，並將在「搜尋失踪美軍」的人道主義立場上，與越南進行對話。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十八日，美國派遣「聯合自動汽車工人工會」主席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率領五人代表團訪問河內。美國為配合此次訪問，在三月三日放鬆對越南貿易的禁運，允許經由越南的外國船隻或航空器進入美國境內添加燃料。

一九七七年五月，美越首次在巴黎舉行談判，越南代表保證加強協助搜尋失踪美軍，美國則同意不使用否決權拒絕越南進入聯合國，並指出外交關係的改善和對越貿易禁運的撤銷，都將隨正常化過程而進行。結果在九月廿一日因美國在安理會放棄使用否決權，而讓越南順利加入了聯合國。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二日，越南外長阮基石於參加聯合國會議時，與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赫爾布魯克舉行會談。阮基石明白表示越南已放棄賠償主張，而且對兩國關係正常化已有充分的準備，尚只剩下細節問題而已。但美國國務院遲遲未採取行動，阮基石等候一段時間未獲答覆，即離開紐約。直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越簽訂「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後，美國政府纔通知越南政府說，有三個問題阻礙了美越關係正常化，此即越南軍隊入侵高棉、難民問題、蘇越簽訂「和平友好合作條約」。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美國國務卿范錫致函越南駐聯合國代表葉文洛（Ha Van Lau）希望繼續進行外交關係正常化之談判。葉文洛亦於七月六日和十二日，在紐約與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歐克禮（Robert Oakley）舉行會談，就美越「關係正常化」問題交換意見，但均沒有獲致進一步的發展。



一九八二年二月廿三—廿四日，由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官員組成的五人代表團訪問越南，代表團團長是國防部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次卿阿米塔吉 (Richard Armitage)。這是美國官方代表在越戰結束後第一次訪越，因此備受各方矚目。

美國與越南為何會在越戰結束後迅速地進行「正常化」的對話？這是引人興趣的問題。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爲了對抗蘇俄和中共勢力的擴張，曾對日本予以大力扶植，企圖以日本和南韓阻擋中共和蘇俄勢力的東向擴張，所以纔不惜與「敵國」合作。今天，美國的西南太平洋戰略構想是否又要利用「敵國」越南來制衡中共的南下呢？或利用「正常化」對話來離開越俄的合作關係呢？

就美國的立場而言，她一方面不願見到越南與中共結盟，也不願見到越南一面倒向蘇俄；另一方面，是美國目前沒有力量再介入印支事務，因此在這種錯綜因素考慮下，爲了平衡亞太地區的權力均勢，美越關係「正常化」的對話，纔開始登場。

第三，要說明美國與寮國的「和解」關係。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寮共取得政權，美寮關係開始陷於低潮。一九七七年初，寮國政府通知美國駐永珍大使館的人員減縮爲十二人（其中不得派武官人員）。一九七七年三月，伍考克於訪問越南後來到永珍訪問，目的在與寮國政府商討越戰期間在寮境失蹤的五百五十名美軍人員之搜救工作。一九七八年八月，美國國會代表團於訪問河內後抵永珍訪問。美國雖在一九七九年發表禁止經援寮國的命令，但美國仍採取對待越南一樣的措施，不反對透過國際機構援助或貸款給寮國。

目前，寮國與美國還保有外交關係，美國對寮國所採取的措施也較對越南和高棉爲有彈性，譬如，一九七六年泰國封鎖泰寮邊境站時，寮國曾請求美國居間斡旋，促使泰國重開邊境站，美國即對曼谷曉以利害關係，謂若不迅速重開邊境站，將祇有迫使寮國更加依附越南。一九八二年初，美寮關係有了新的發展，美國援助永珍一家大醫院，而重新引起寮國向美國請求提供援助的希望。

第四，要說明美國與北韓的「和解」關係。自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即全力支持南韓。在美國的東北亞戰略構想中，南韓成爲防止共黨勢力東向太平洋發展的一道屏障。南韓一旦不保，日本亦將岌岌可危，而美國的西線防禦鏈鎖就面臨瓦解。但是在歷經一個世代後，美國改變了早期的「圍堵」政策，而與當年「抗美援朝」的中共攜手共唱戰略合作的調子（這或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在大戰略變更之情勢下，美國對朝鮮半島的部署，必然也要做相應的調整。

一九七五年，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聯大大會上演說時，首度提出「交互承認」南北韓的觀念。季辛吉認爲這個方法是解決韓國問題的最佳途徑。南韓總統全斗煥則建議「交互承認」的第一步，應先由中共承認南韓，同時由日本承認北韓，第二步再由強權國家「交互承認」兩個韓國。美國積極支持南韓所作召開南北韓和談對話的主張，並希望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但中共對於上述建議顯然缺乏興趣，再加上北韓極力反對，而使這些建議未能實現。

從美國對朝鮮半島的新主張來看，可以了解在美國反蘇的大戰略下，希望南北韓「和解」，及希望強國承認二個韓國的既成事實和現狀，以維持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不過北韓跟蘇俄及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時北韓也是蘇俄及中共競相爭取的對象，美國希望蘇俄或中共不支持北韓而承認南韓，絕難實現；尤其在美國「聯中共制蘇俄」的策略下，更不可能促使蘇俄承認南韓。因此，就目前的情勢來看，所謂「交互承認」的主張，因屬不切實際，美國對北韓的新「和解」政策也就窒礙難行了。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美國爲了對抗日漸擴張的蘇俄勢力，已改變了冷戰時期以來的「圍堵」政策，而爲了達成「權力平衡」的戰略目標，馴至放棄了意識形態的對抗。美國對共黨政權採取的具體的「和解」行動，包括美國與中共建交，並進行密切的貿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及軍事合作，與越南進行「關係正常化」對話，對越寮進行間接援助，與北韓進行「和解」示意。總之，美國對亞太地區共黨政權採取的「和解」政策，已完全改變了傳統的亞太權力均勢關係。至於這種正在形成中的「和解」關係會發展到何種程度，可能須看蘇俄勢力擴張的程度及中蘇共「和解」的程度而定。此外，我們尚須了解，美國的這種新「和解」政策，必然會損及美國的傳統盟邦對它的信任感，畢竟，美國與政策捉摸不定的共黨政權進行「和解」及戰略合作，將令美國盟邦中的自由民主國家感到困惑與懷疑。

#### （四）李登科先生：上海公報後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

上海公報是前美國總統尼克森與中共「總理」周恩來在十一年前於上海共同發表的。雖然美國與中共並未緊跟著該公報的發表而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雙方「非正式」的關係，包括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等等，却因此獲得顯著的發展。當然，雙方也從此不必再以「不可告人」式的方法來進行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往。

根據尼克森以及其謀士季辛吉的說法，尼克森的中國大陸之行和上海公報的發表，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石，更確保了美國的国家利益。尼克森與季辛吉同時並強調說，美國在上海公報中並沒有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而這項公報也不影響美國對其盟邦們的安全承諾。

尼克森的中國大陸之行和上海公報的發表，真的像他所說的有助於世界和平，並且也不犧牲任何第三國的利益嗎？這是一項常引起很大爭議的問題，或許各位也可發表一些高見。

其次，讓我們談談上海公報後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情形。在尼克森總統未下臺以前，美國與中共除了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外，在其他方面如文化與科技交流、貿易往來等等，似乎都進行得相當順利，同時雙方對反霸權主義的觀點亦頗接近。尼克森總統去職後，由福特總統繼任。在福特的任期裏，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已呈緊張狀態，因爲中共一直對美國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建交三條件，但爲美國所拒。或許也因爲這個原故，雙方的貿易額在這一段期間，竟然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一九七四年，雙方的貿易總額爲美金四億七千五百萬元，一九七六年爲美金三億一千六百萬元）。

卡特就任總統以後，布里辛斯基極力主張打所謂的「中國牌」，執行「聯中共以制蘇俄」的策略；而卡特本人也希望與所有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認為將有助於世界和平。在這兩種想法之下，美國政府對與中共建交一事，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政府接受中共所提的建交三條件，宣佈將在翌年元月一日，與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卡特總統的這項宣佈，使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進入另一個蜜月時期，雙方的高級官員往返頻繁，鄧小平甚至在一九七九年元月親自訪問美國，製造雙方關係的一個高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進兵阿富汗，引起卡特總統的強烈反應，他不但宣佈對蘇聯採取穀物禁運，拒絕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一九八〇年世運會，並且開始傾向中共，也就是不再對蘇聯與中共採取均等的外交政策。尤有進者，在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於一九八〇年元月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雙方更建立了軍事合作關係。美國這一連串討好中共的行動，可說是種下後來雙方產生嚴重爭執的一大根源，因為北平的領袖們認為他們正可利用這種情況來抬高中共的身價，加強對美國的勒索，包括要求美國中止對中華民國軍售，要求美國允許對中共輸出更多的科技，以及要求美國對中共的輸出品予以優惠待遇等等。所以說，即使卡特繼續擔任總統，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依然將要下降，除非美國對中共的無理要求作重大讓步。

雷根總統就任後，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進入另一個階段。雖然雷根總統曾在一九八〇年大選時，指責卡特政府不應以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為手段，來達到與中共建交的目的，但是雷根政府仍願意與中共維持友好的關係。事實上，在一九八一年六月海格國務卿訪問中共的時候，美國還曾宣佈將對中共出售具有攻擊性的武器。然而中共却不滿意，既不按原定計劃派遣一軍事代表團到美國，亦不願再與美國高唱戰略合作。更令美國政府失望的是，中共在一九八一年以後，開始與蘇聯眉來眼去。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雙方居然恢復面對面的磋商。

目前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可以說困難重重，這些困難包括剛才所提到的科技交流問題、文化交流問題、美國對中華民國軍售問題，以及貿易糾紛等。由於這一些問題，再加上雙方的互相猜疑與內部的爭論，使得雙方的戰略合作關係呈現休止符狀態，而軍事合作關係也發生困難。為何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面臨著這許多難題？這些困難能獲得解決嗎？雙方未來關係的展望又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詳加研討的。

#### (五) 陳鴻瑜先生：美國、中共、日本的三角關係及未來發展

在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日本搶先在一九七二年與中共建交，進而在一九七八年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其中包括了聯合「反霸」的條款，因此，導致一般評論家認為美國、中共、日本三方有結成政治或軍事同盟的趨勢。

這種看法的基礎是，美、中（共）、日達成軍事協商（Entente）的概念，其目標乃在亞洲形成對蘇的「圍堵」。在戰略理論上，美國希望利用「北約」截堵蘇俄的西向擴張，而利用美、中（共）、日「同盟」來圍堵蘇俄向東擴張，但實際上，這種構

想面臨著許多阻力。

一般而言，在亞太地區要成立類似「北約」型的區域安全組織，條件並不充足，而且也受到三國內部的限制。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能夠發揮作用的是雙邊條約關係。一九五四年根據「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所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已在一九七七年解散了，因此，是否能在亞太地區重建集體安全條約或組織，殆成疑問。再者，關於美國與中共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問題，美國領導階層也是爭論不休。雷根政府對中共的態度是，唯有中共經濟成長和政治穩定，纔足以讓中共承擔反蘇的角色。然而爭執的焦點在：軍力強盛的中共是否真能牽制大部分蘇俄的軍力？美、中（共）「結盟」是否有助於降低未來中（共）蘇「和解」的可能性？中共新增強的軍事力量如果用在亞洲，有可能符合美國的利益嗎？美、中（共）、日一旦結成「軍事同盟」，有可能成爲美、蘇、限武談判的新阻礙嗎？或者，有助於解決亞太地區的危機嗎？儘管這些問題一時不易獲得答案，但是在美國既定的「權力平衡」戰略考慮下，美國與中共的軍事合作仍然在逐步進行中。

其次，要說明在美、中（共）關係中，日本的角色和立場。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也是第一個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因此戰後第一部憲法標榜著「和平主義」，其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戰爭做爲國家的主權權利……，將不再維持陸、海、空軍及進行戰爭準備。」換言之，「和平憲法」放棄了設置軍隊及放棄交戰權。但日本基於維持國內治安及防禦外患之需要，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與四十八個國家在舊金山簽訂「和平條約」，該約承認日本有自衛權。同日，日本並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雙方重修訂新約，明確規定美國對日本的防衛義務。

然而「美日安保條約」祇限於防衛目標而已，並不包括攻擊他國的行動在內。依據日本防衛廳在一九七九年所公佈的「日美防禦合作指針」之規定，一旦日本遭受到外來武裝攻擊時，日本在原則上是獨立排除小規模而有限的侵略，同時依據侵略的規模和形態，若日本獨立排除有困難時，則等待美軍的來援，將侵略軍排除之。另據一九七九年日本「防衛廳白皮書」的報告及日本國會通過的決議案，「在現行憲法下，不允許派遣武裝人員到國外，從事軍事行動任務。」從而可知，在憲法及有關條約之限制下，目前日本所能採取的軍事行動祇限於本土的防衛，而不可派軍到國外。因此，日本是否能與美國和中共結成互相援助的軍事同盟，頗有疑問。

就現階段三方關係的限度而言，美國與日本，或美國與中共，或中共與日本等的雙邊關係，應該比美、中（共）、日的三邊關係還更爲重要。即使如此，雙邊關係也是很很不穩定的，特別是被視爲穩定亞太地區的美日關係，却在進入一九八〇年代時，在經濟、安全和政治上出現了緊張。譬如，在經濟方面，美國希望日本消除各種非關稅障礙及開放輸入美國商品的市場，以減少雙方大量的貿易逆差。在安全方面，美國基本上希望與日本進行三方面的合作：(1)繼續加強美日在聯防計劃上的合作，爲應付緊急需要，應發展一個高度現代化的日本防衛武力，使之能承擔廣泛範圍的防衛任務；(2)擴大日本監視日本本土外一千哩西太平洋地

區的海空航線；(3)日本應參與鄰近國家的非正式的防衛討論。美國了解日本在接受承擔直接區域安全責任上有憲法上的阻礙，因此，美國希望日本在不修改憲法及不發展核子武器之情況下，能夠對亞太安全及日本防衛做出更大的貢獻。在政治方面，美國認為日本採取市場取向的外交政策，一切以經濟考慮為出發點，故在情感上很喜歡「等距」外交，而忽略了對不同危害性國家採取不同的政策。因此，美國極希望日本了解，為了謀取日本的利益，應該建立一個對蘇俄的獎懲制度。但是日本目前的態度還是猶豫不決，多數日本人民雖然強烈反對蘇俄，惟尚未對蘇俄的直接攻擊威脅有深刻的感覺或恐懼。日本外務省和防衛廳在一九八一年甚至還為了蘇俄是否已對日本構成威脅的問題而發生歧見。

其次，在美、中（共）、日三角關係中，中共是個不確定的變項，中共領導階層經常發生權力鬭爭，而可能影響與美、日的關係；此外，中蘇共自一九八二年開始進行改善關係的談判，雙方如果達成「和解」，則美國所構想的聯合反蘇的戰略目標，就將難以達成了。

第三，我們要注意美、中（共）、日三角關係改善，可能造成的二種影響：(1)日本與中共關係在近年已有顯著的改善，中共並請求日本予以鉅額貸款。然而，日本若經援中共，將間接影響「東協」的經濟競爭力量，日本必須注意「東協」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對日本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要素。(2)美、中（共）、日關係的改善，可能會影響蘇俄加強支援北韓和越南，而導致亞太地區更趨於緊張和不穩定。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為了維持亞太地區的權力均勢和穩定，美、中（共）、日三方將採取緩進的步伐，先求在戰略上達成聯合的「共識」，而非迅即建立有形的「同盟」組織。目前，西方部份人士認為美、中（共）、日三方所達成的「共識」，包括：(1)暫時地容許美國維持在亞太地區的軍力；(2)維持美日安保條約；(3)維持亞太的均勢；(4)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但就中共所發表的言論以觀，此種看法是否正確，仍值懷疑。

最後，必須指出的，基於美、中（共）、日三方「聯合」基礎的脆弱性，因此，對於目前三方所進行的戰略合作，祇能說是已完成了「防俄」的共識及心理準備，但無法說已達到了「反俄」的程度。

#### (六) 李登科先生：中華民國應如何加強對美關係

雖然我國和美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已經中斷，但就我國當前的處境來說，對美關係仍然是我國外交工作上最重要的一環。

因此，我們應該詳加研究如何加強對美的外交活動，以強化兩國之間的各種關係。關於這一方面，個人願意提出一些淺見，俾供參考。

第一、我們應先確立對美外交工作的目標。任何機構如果沒有明確的工作目標，不但會妨害工作效率，更容易造成人力與物力的浪費。外交工作也是一樣，應先有了目標，然後才能事半功倍，努力以赴。依照個人的看法，我國對美外交工作的目標宜分

成短程、中程及長程三種。短期目標應該是確保既有各種關係，包括確保臺灣關係法的完整性；中程目標似可擬定為擴大雙方非官方的各項機構與人員編制，並且防止美國在對我軍售一事上再度落入中共的圈套，受到中共的脅制；長程的目標則是設法提升乃至恢復中華民國與美國的正式外交關係。

第二、加強研究美國對外政策，包括貿易政策、安全政策、軍備管制政策等等。我們唯有從全盤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着手，才能深入瞭解美國對中共的外交政策，然後提出因應之道。在加強研究美國外交政策一方，國內各有關研究機構似可集中有限的人力與物力，共同合作，以集體研究的方式取代單打的做法。在研究資料方面，也應儘量充實力求完備。

第三、站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和美國學術界建立更密切的學術交流。我們都知道，美國學術界最重視的是學術研究成果，而美國研究中國事務的學者專家們對其政府的對華政策又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我們應朝這方面向與他們交往。具體的方法包括在國內出版高水準的學術刊物、鼓勵國內學者踴躍投稿於美國或其它國外的學術性刊物，以及擴大邀請著名美國學者來我國做學術性訪問。

第四、外交部應強化政策設計與研究發展部門，並設立美國研究小組。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設計部門經常為國務院擬定政策選擇與分析外交上的難題，由於該部門研究人員素質很高，資料又豐富，因此所擬的研究報告對美國政府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反觀我國外交部的政策設計與研究部門，不但缺乏專門的研究人員，也沒有足夠的經費；資料的蒐集似乎也不夠，應儘快設法改善；如果一時無法全面推動，至少應先成立美國研究小組，邀請回國使節及資深外交人員或聘請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擔任研究工作。

第五、爭取更多的美國國會議員支持我國。美國國會議員，特別是那些最具影響力的議員，對行政部門的政策影響很大。如果我們能獲得這些重要議員的支持，中共就難脅迫美國行政當局採取對我不利的政策，如修改臺灣關係法或減少對我軍售等等。必須順便提出的是，我們爭取的對象不應僅限於保守派或某一政黨的議員，我們應多多益善，結交更多的朋友。

第六、經濟部似應進一步簡化外人來華投資法規與條例，以便吸引更多的美國企業界來我國投資。經濟關係的加強有益於兩國的政治關係，中美斷交時，美國在華企業界曾為我仗義執言，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另一方面，今天我國想要提升既有工業水準，也有賴先進國家企業界的幫忙。因此，我們應在互利的情况下，主動爭取美國企業界來華投資，而這一項工作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

第七、新聞局與我國民間的大眾傳播事業合作，擴展與美國大眾傳播界的關係。譬如新聞局可制定辦法，鼓勵國內電視臺與美國電視臺合作或交換演藝人員，或鼓勵國內報界邀請美國報界領袖到我國訪問等等都是可行的辦法。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因為美國大眾傳播工具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力是有目共睹的。

第八、政府有關單位應輔導國內企業界到美國投資。目前我國企業界到美國投資的愈來愈多，不過却是各做各的，而且一般來說，規模都不大。這種缺乏計畫的個別投資方式對增進兩個之間的經濟關係或國民外交而言，效果相當有限。個人認為經濟部、外交部、財政部以及新聞局應相互協調，擬定對美投資策略，包括投資項目、地點、資金等等，務必使這些投資既能獲得利潤，又可增進兩國關係。在美國彌漫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中，這一項工作的確刻不容緩。

第九、外交部與其它設有駐美單位的機構應謹慎選派駐美工作人員。各單位的駐美人員是我國對美外交工作的先鋒部隊，因此一定要能勝任各自的工作。並且要絕對摒棄本位主義，加強協調合作，共同促進我國的對美外交活動。最近錢復先生出任駐美重職，所以能獲各方好評，主要原因是錢先生具備了優越的條件。錢先生的例子足可供其它單位借鏡。

第十、美國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國家，一般民衆對各項政策的制定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同時我國現正全力推行總體外交，需要民間力量的配合。故今後設法促進中美兩國人民間的密切交往，爭取美國民衆對我之了解與支持，亦為我加強對美外交活動工作中重要的一環。

以上幾點是個人的一些淺見，或許不很成熟，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提出寶貴的意見，共同討論這一項十分緊要的問題。謝謝！

## 七、自由發言

孫震先生：

剛才聽到區鉅龍先生的引言報告說，美國國內的經濟重心，有從東岸轉向西岸的傾向，這樣的變化實在與整個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有密切的關係，各位大概都很熟悉美國Hudson Institute的Herman Kahn有所謂四百年一次的Great Transition Period的講法。他認為整個世界經濟有四百年一次的轉移週期，從過去的低所得時期轉移到四百年後相當高所得的水準。假定我們把一七七六年當作現代經濟發展的開始，那麼到一九七六年美國獨立兩百週年時，一半時間已經過去了，現在面臨的另一半的兩百年。回顧過去兩百年來，世界經濟的舞臺是在大西洋的兩岸，當年在經濟發展中的國家，現在都已成爲世界的工業先進國家，到目前爲止，可以說控制了整個世界經濟的舞臺，美國就是其中的一個。然而有些國家的經濟已經開始下降了，而仍然繼續上升的國家只有少數，即使那些還停留在一定水準的國家，也難免有沒落的感覺，美國就是其中之一。

晚近，太平洋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確實相當快速。由於這一地區經濟、地理、文化和歷史的關係，使這一地區國家經濟發展的情況各不相同，可以說世界上各個發展階段的典型，在本地區國家中都有了代表，太平洋地區的一些國家和日本、澳洲和紐西蘭相形之下雖然仍舊相當落後，但是通常我們總是把日、澳、紐三個國家，視爲本地區的工業先進國家，至少OECD的先進國家持這種看法。另外也有幾個生活水平相當高的開發中國家或地區，包括大韓民國、中華民國、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個地方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特別神速。各位可以看一看，最近幾年來，新興工業國家的數目，不論有人說是八個

，也有人說是十個，經過一九七三年能源危機以來的衝擊和淘汰，現在真正還經得起考驗的只有上述亞洲的這四個國家和地區，原來那幾個位於中南美洲的新興工業國家如墨西哥、巴西等國都發生了很嚴重的經濟危機。另外有幾個國家與上述四個地方相比，無論在開發的層次或生活的水平上，都是相當落後的，但是和世界上其他開發中國家比起來，成就依然並不平凡，如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雖不如前面所說的四個國家和地區那麼快速，但是也都到達相當成熟的階段。它們給我們的印象是潛力無窮，在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後面緊追不捨，似乎已無形中給我們帶來了壓力。從這一發展的觀點來看，的確世界經濟的中心已有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盆地移動的趨勢。

我們回顧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生產力量雄厚而龐大，使它能控制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舞臺。現在由於其他地區經濟快速地發展，美國相形之下比較緩慢，其GNP在整個世界GNP中所佔的比例已經不到四分之一，或者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樣子，所以它自感力量日趨薄弱。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無論在大西洋或太平洋，其態度一直都在不斷地轉變，特別在太平洋地區，我個人粗淺的看法認為，美國不願意再像過去一樣在這一地區扮演領袖或老大哥的角色；它甚至於寧願站在幕後，把這個地區的國家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地區出現各種不同形式的創意，來推動形成一個亞太地區或太平洋盆地經濟共同體的構想。雖然這種構想由不同的國家、單位，以不同的背景與形式來提出，但是要求促成地區性經濟合作的傾向則是一致的。就個別的情況來看，這一地區國家中的日本在經濟成長上，現在已緊跟在美國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經濟強國。我記得好像有一本書曾經說，日本要超越美國變成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也未嘗不可能。我常常講我們中國人的哲學是，當一個國家成為世界第一時，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變為世界第二，而讓世界第二的國家向前超越，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從過去的世界第一，逐漸變為第二、第三，甚至還在繼續下降。美國今天的處境也是這樣，現在日本的力量非常強大，在許多方面讓美國感到沒有還手之力，甚至毫無招架之功。另外在日本以南的國家，如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五國，對美國和日本的影響力一天比一天擴大而壯闊，而讓我們中華民國覺得夾在南北兩大勢力之中，處境相當困難。我個人覺得，在這一地區某種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恐怕早晚會形成，但其結構則可能相當鬆弛，很可能構成一個由政府幕後支持的民間組織。這樣一個組織，假定包含我們中華民國在內，必然會帶給我們許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我記得不久前來我國訪問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得主路易斯（W. A. Lewis）在瑞典接受諾貝爾獎金時發表的一篇演講，講到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緩慢，則世界貿易的成長也會慢下來。他還提到發展中國家本身應擴大對外貿易。不過就目前的情勢來看，並不十分樂觀。但是假定在這一地區有某種形式的合作，儘管是非常鬆弛，對開發中國家發展貿易，應該有很大的幫助。現在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出現一種危機，那就是區域性經濟合作組成後，從我們的立場來看，當然希望中華民國包括在內，而中國大陸則被摒棄在外。但是我們也看到，許多國際性與區域性的會議，我們常被排斥，或者根本不邀請我們參加。所以將來如果有這麼樣的一個地區性經濟合作組織，我們是否會被包括在內，必須事先妥為因應。從



經濟的觀點來看，我覺得我們應該包括在內，但是否因為其他國家怕得罪中共，而使得我們遭到排斥，使得這一對整個地區都有利的組織，最後對我們反而不利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我覺得從經濟觀點來看中美關係，我們要設法運用各種關係，使我們在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研究和形成的過程當中，能參與各種活動，使得各種組織方案中都把我們中華民國包含在裏面。我覺得這是目前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我看不出美國會主張排斥我們中華民國，但是也許本地區內的國家，爲了避免政治上的緊張，或有邀請中共而排斥我們的可能性。在各種促成區域性合作的活動發展之初，我感覺到中華民國參加得非常少，但是晚近以來，我們參加活動逐漸頻繁，這似乎是一種有利的趨勢。我想在座的很多先生都知道，我們政府成立了一個參加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活動的指導小組，由外交部朱部長和經建會俞主任委員兩人共同主持，希望把國內的資源組織起來，然後通過各種途徑來參與各種活動，使我們成爲這一地區性經濟合作組織中的一位活躍的會員，將來透過地區性的組織，維持並加強對美的關係；或者通過對美國的關係，來鞏固我們在地區性經濟合作組織中的地位，這可能是我們將來努力的一件大事。

陳長文先生：

我想提出幾點個人的看法供各位參考指教。談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對中華民國的關係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改善已經走向了一定的途徑，換句話說已不可能走回尼周公報以前的情況。從這個基本認識，我們也看到它們彼此之間所謂改善關係的一些障礙與阻礙，從中可能找出有助於我們和美國關係改善的途徑；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美國與中共改善關係的阻礙究竟是根本的阻礙，還是一種技術上的阻礙。我個人認爲，有許多重要因素會改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例如中蘇共關係改善的程度。但是基本上來講，這些阻礙應該屬於技術上的阻礙；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在心裏上有所準備，那就是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是可能改善到它們預期的境界，因此我們應該如何因應這種情況的出現。這種改善當然包括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改善，特別是經濟上的改善，我們不要忽略。我個人粗淺的看法認爲，目前就經濟與關係來看，不外資源、人力和規劃等重要課題。就資源的開發而言，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具有相當大的潛力，目前有很多合作的計劃在進行之中，至於是否會很快地得到結果，還無法預測；可是從它們雙方在經濟上往這一方向去發展，並進行合作，很明顯可以看出和一九七〇年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大陸在觀念上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如對於私有財產的有限度的肯定，至少在目前看來，這是中共的政策。那麼從這一政策來看，美國國內很多大企業對大陸市場的憧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如果經濟關係能夠有所改善，那麼美國與中共在政治利益上的結合，再和原先在戰略上彼此的一些假設相結合，並不是不可能的。誠如剛才孫先生所提到的，將來的可能性應該是，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發展以及我們與美國關係的發展，可能必須齊頭並進。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作戰上應如何因應，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問題。今天我們已經面臨挫折，對於以後十年的競爭，究竟是否應該在戰略和戰術上有一個相當根本的改變，是我們大家應該注意的。

另外一點就是關於美國對中華民國軍售的問題。我認爲自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廢除一直到「八一七公報」的發表，美國似乎已把我們中華民國的安全，放在美國相信中共沒有力量或者中共不會用武力來攻取臺灣的認識上。因此從軍售的角度來看，雖然我們了解美國還是賣了相當多的武器給我們，但是我們同時也了解，有一些武器並不是很有攻擊性而對我們具有相當重要性的武器，美國竟然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這一種對它自己來講是很有信心的認識，對我們來講則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這或許又回到了剛才孫先生已經談到而未進一步延伸的問題，那就是究竟我們今天能否使自己在美國與中共，甚至於美國與亞太政策之中，變成一個主要的角色。關於這一點，我很希望各方面共同研究，然後擬定一個計劃。當然剛才孫先生提到經濟的問題，看來非常重要。今天我們在外交和政治方面比較佔了下風，而在經濟上，由於我們長期的發展與繁榮，使得我們具有相當的份量。最近我們民間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也參加了一些民間的經濟組織。這一點可能使我們將來在政治方面獲得回報。

最後一點就是關於外交工作權責的統一問題。這一點我們已經談了很多，至於怎樣才能很切題的把這一問題作一根本的檢討、解決，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權責的統一問題外，還有駐外人員的熱忱以及駐外人員應具備的條件。這些都是我們在加強對美關係的努力上必須做好的工作。

張京育先生：

我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女士和先生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我們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工作，由於本身能力的有限，各方面都要仰賴我們中心以外、甚至政治大學以外的學者專家來給我們協助和指導；更由於我們平時所接觸的各行各業的人很多，有時候他們的需求，不是我們中心所能充分的供應，所以也常常會麻煩各位給予支援。我們很希望今後仍然繼續得到各位的協助，來共同推展我們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繫及交流的工作。我因為還要去參加中國大陸組所召開的另一場學術座談會，祇得先行告退，很對不起。

李鍾桂女士：

(一)首先我認爲「中華民國應如何加強對美外交活動」的子題名稱似乎值得研究。雖然外交的定義是「對外談判交涉的藝術與科學」，可適用於所有邦交與無邦交國家；可是一般觀念認爲外交是指有外交關係而言。目前我們和美國既然沒有外交關係，因此我建議將「對美外交活動」改爲「對美關係」。

(二)新聞局長宋楚瑜最近提出要讓外國人接受「中共非中國」「中國非中共」的事實。這是會後我們在國際組織保持席位及參加各項國際活動很重要的一環。因此我今天向各位求教，如何說法，最爲恰當。因爲不少人以爲在「八一七聯合公報」中，美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者，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即等於承認「中國」就是指「中共」，甚至於臺灣是中共的一部分。儘管我們認爲美國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正和我們的立場一致，因爲我們從來沒有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在多數

美國人的觀念中，仍以爲中共就是中國，要如何改變這個觀念，是當前刻不容緩的研究課題。

(三)建議事項：除李登科先生所提報告中十項工作之外，我認爲：

第一、政府應增列預算，鼓勵國人參加國際學術性會議發表論文，提高我們在國際學術上的水準，增加各國對我們的重視。

第二、我們對美活動除經貿、政治外，諸如體育的競賽、教育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不可偏廢。

第三、促使國內傳播媒體如何創造國家美好的形象，宣導國家的政策、立場，使美籍人士對我們有正確的認識。

第四、如何促進在美國的所有僑胞、留學生、學人以及各界人士團結合作，構成壓力團結，一心一意爲爭取中華民國的利益而奉獻智慧與力量，如能做到以色列在美國的猶太人那樣心向祖國的話，相信中美關係必然會有較新面貌出現。

第五、儘量運用民間團體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交互訪問，擴大雙方廣大羣衆彼此間的認識與情誼。

邵玉銘先生：

對於李教授剛才所提到的問題，我在國內與國外也經常被別人問到，我的解釋也從來沒有和國際法專家好好地作過研究和討論，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因爲從「上海公報」和「八一七公報」到今天爲止，美國所說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其中「中國」一詞，美國從來沒有解釋過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抑或是「中華民國」。當然從邏輯上講，可以說那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美國從來沒有明說過。當然美國不能這麼明說，因爲美國一旦說臺灣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那麼它就沒有辦法再賣武器給我們。這種情況對我們有利的地方是美國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至於指的是那個中國，美國並沒有明說。對我們中華民國而言，也可以解釋爲臺灣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因此美國根據臺灣關係法，還可以繼續對我們售賣武器。換句話說，我們並不受那個邏輯上的說法，而是根據現實，因爲臺灣確實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之所以從「上海公報」到「八一七公報」，從來沒有把中國一詞加以解釋，這證明美國並不受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的說法。我的解釋是否恰當，還要請國際法專家陳長文先生加以說明。

現在我願就剛才聽到各位的報告，尤其是中華民國應如何加強對美關係，提出幾點具體的建議，以便符合國家當前的需要。

(一)我國對外關係單位，應邀請國內外中國籍或華裔學者專家成立顧問委員會，分國內、外兩個。將我國對外關係各重大問題交由此兩委員會研究，然後由我對外關係單位擇其高明建議而執行之。

(二)對外邀訪，今後似應加重邀請自由派甚至非友我人士，以化敵爲友或化中立爲支持。

(三)國內文化單位或主管對外宣傳單位應製出一系列介紹有關中國文化之電視節目，洽商美國電視臺播放，以使我國在美國人

民心目中成爲中華文化的象徵。

(四)在美國各大城市成立中美人民友誼協會，邀請在美之親我中外人士參加，以推展中美關係。邀請人士名單，應由國內和外國有關各單位，根據歷年來往資料整理出來，然後按城市分別組成此種協會。

(五)今後我國的有限人力物力應儘量少花在破壞「美匪關係」上，以免引起反感，而應多花在增強我國與美國關係上。

曹俊漢先生：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想針對第一個子題「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政策中的重要性」繼續提出一點意見。從越戰以後，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已在美國全球政策中逐步消滅。但這並不意味著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政策中不具有重要性，而是美國的 global 戰略和政策有所改變。就當前情勢來講，大家所重視的要算太平洋盆地社區（The Pacific Basin Community）的未來發展。我想這一區域性組織的構想，其經濟性大於政治性。就這一問題的本身來說，我們雖然也開過這一方面的國際會議，希望促成這一社區的具體發展。但是我們除了鼓吹和提倡外，還需要促使對這一構想有影響力的人士，共同提出有利於我們的主張。這樣一來，我們被排斥的可能性就會相形減少。剛才有好幾位先生提到亞洲開發銀行的會籍問題，我認爲在五月即將召開亞銀理事會的節骨眼上，我們要設法維持亞銀的會籍，不管採用何種模式，我們的立場一定要比較具有彈性，先將會籍加以確保。雖然亞銀對我們今天的經濟發展，據我的研究，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實益；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要建立一個先例，一個大家所承認的先例，以協助我們開拓在其他國際性或區域性組織中的地位。亞銀雖爲一個經濟性的組織，但却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如果在這一組織中，建立一個使我們保留會籍的模式，將來有利於確保我國在其他類似組織中的會員國地位。

從戰略觀點來看，自從蘇聯在越南建立基地以後，我們特別要強調海運線對美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重要性，而我們在這條海運線上，無論從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來看，我們都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其次東協五國的整合與發展方向，我們也應該密切注意。去年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問泰國時，曾再三強調要向泰國提供軍事援助。後來溫伯格又訪問了印尼，他曾公開表示，要在印尼成立一個東南武器系統製造中心，來加強東協的軍事地位。最近澳洲大選，工黨執政，其政策相當傾向於蘇聯，使東協五國極爲關注。這種情勢的發展，可能是將來我們與東協關係的一個契機。

張德光先生：

剛才看了中心所供給的書面資料後，覺得你們的準備非常充分，研究工作做得非常紮實，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聽到一位女士和諸位先生的高見，深感獲益不淺。我對於書面資料所提中華民國應如何加強對美關係的十點意見，也覺得非常詳盡，在其他許多次會議中也聽過類似的建議，但結果都是會而不議，議而不行。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的此類會議，會後能夠付諸實施，而且要持之以恆，那麼才會有成果出現。

其次我們要發展民間往來，以彌補中美官方關係的不足，因為現存的中美關係建立在非官方的基礎之上，所以民間往來非常重要。再者中美兩國之間建立姐妹州和姐妹市的關係，可以說是國民外交往下紮根最基本的途徑，但一定要以平等互惠為原則。關於中美學術交流方面，不要太著重在請客吃飯，因為美國人大吃大喝後回去時，可能要講臺灣不好，以表示立場之公正，如果講臺灣好的話，難免有被賄賂之嫌；而且唯有如此才能成為下次被爭取的對象。這種現象一定要設法改變。可是如何改變呢？與其把美國的中國通請到國內來訪問，回去後又說我們不好，我們為什麼不派一批人出去呢？這樣多少可激起一些漣漪。所以我認為，與其請別人來從事學術交流，倒不如派一些人出去從事學術交流，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提出論文，或在其他表演場合，提供一些節目，我想這樣做的影響可能比較大。就拿「國際政治學會」來講，其前任會長正在這兒訪問，我們希望他能協助中華民國入會，可是入會後又有什麼意義呢？據我參加「國際政治學會」十三年來的觀察，一九七〇年雷飛龍先生曾往慕尼黑參加會議，去年張主任京育曾去巴西開會，前後就這麼兩次。現在我們在爭取加入該協會，但是入會後一定要每年派人去參加年會，提出論文，才有實質的意義。我想國內很注重體育，經費也很充足，如果能將體育風氣吹一點到學術交流方面，那麼其成就可能大為改觀了。國內的學者大多只有智慧而缺乏財力，如果政府對於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學者，給予旅費補助，我想在國內目前人才濟濟的情形下，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的。而且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應該制度化，選派代表，不僅要依據年資，而且要重視學術上的成就與表現。如果一位代表參加學術會議的論文能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就應該當作他的學術升等著作，使有才能、有貢獻的人均能出人頭地，這是對學術界的最大鼓勵。

金神保先生：

今天聽到各位引言人的報告，都提到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重視，我想這是我們大家都樂於見到的現象。不過剛才區鉅龍先生講到美國和歐洲關係非常密切，在美國的全盤外交關係衡量中，今天的亞太地區是否能和歐洲地區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我個人很感懷疑。因為歐洲對美國的影響力遠比亞洲來得大，最低限度，亞太地區的領袖就沒法像歐洲地區領袖和美國領袖那樣的平等交談及受到重視。我們知道當年美國參加越戰，歐洲人在背後扯後腿，對於越戰結局可以說發生了相當大的作用；而從現在的情勢來看，在西歐國家的整個攻勢下，美國是不是會整個轉向亞太地區來，我個人採取一個保留的態度。

其次，美國在亞太地區願意付出的資源很有限，而且美國始終認為它的力量已不如往昔，因此在目前如何平衡亞太地區勢力的問題上，首先要考慮的是本地區的危機，也就是蘇聯企圖打破美國圍堵網的海權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當然要支持日本和韓國這兩個環節；也要考慮亞太地區可能發生武裝衝突的危機地帶。一個為朝鮮半島，另一個是中南半島。這兩個地區的武裝衝突是美國所不願見到的。美國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恐怕必須得到中共的合作。亞太地區如果發生動盪，恐怕對我們並不利，而照現在這樣的持平下去，可能對我們還比較有利，因為美國沒有必要對中共作太大的讓步；如果這一地區產生一個很大的

不平衡狀況，美國爲了要共同應付，其發展就很令人擔心，剛才也有幾位先生談到中南半島的武裝衝突，我想這中間主要的是泰國的問題。泰國過去一向希望利用外在強權的力量來保持其本國的完整，我看不出越南會攻打泰國和馬來西亞，因爲像越南這樣的一個需要重建的國家，其內部問題還很多，整合的問題也很大，所以越南不見得會出兵泰國。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亞太地區能維持平衡，對我們是有利的。

在李登科先生的報告中，有關中華民國如何加強對美關係活動中，似乎還有一點可以加以強調，那就是我們爭取亞太地區國家對我們的支持，對美國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過去往往只去爭取美國，而忽略了如何設法使鄰國來幫助我們影響美國的政策，日本對中共的立場就是一個例子。目前我們即將面臨的是亞洲開發銀行的會籍問題，如果我們不去爭取本地區鄰國的支持，而專門去依靠美國的支持，這種作法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要以加強對美關係爲中心，再透過我們與亞太國家的關係，去影響美國，去加強對美的工作。當然我們如果能在歐洲方面爭取更多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這是一種政策的優先問題，我們不應加以忽視。

關於李登科先生建議的第六和第八兩點，據我所知美國國務院在對外投資方面，經常向美國企業界打出許多信號，所以並不是我們修改一些計劃，美國人就會前來投資，至於第八點，恐怕也有很大的困難。不久前我看到一個報導，僅臺灣流入美國加州洛杉磯一帶的資金，其數字就相當龐大，所以加強對美國的投资一事，我們大可不必擔心，今天臺灣流入美國市場的資金已經不在少數。從賬面上看，我們和美國的貿易有相當多的順差，但是實際上恐怕順差並不那麼大。我們表面上是賺了錢，實際上我們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在美國置產和移民，資金也有相當的轉移，實際上這是在援美，而不是過去的美援。所以吸收美國的投资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問題，還是如何加強我們和亞太地區國家的相互關係，來影響我們的對美關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所能掌握的，也是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的。

楊逢泰先生：

剛才聽了各位先生女士的高見，使我獲益不淺，現在願就幾點不成熟的看法就教於各位。我們爲了當前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的發展，加強對美關係固然很重要，但是團結我們海內外的中國人，也是一個基本的重要因素。就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常常犯了偏狹的漢族主義的觀念。我們知道在海外的中國人，不只是漢人，而且還有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雖然他們的人數不多，但是仍然是一股力量。尤其根據研究中蘇共關係的美國學者的看法，蘇俄一向懷有肢解中國大陸邊疆地區的陰謀，一方面支持內蒙，另一方面支持新疆和西藏各民族，來對抗中共。中共在這種情況之下，被迫開始和蘇聯進行談判。所以我認爲今後我們對海內外中國人的聯繫，不要再存有偏狹的漢民族觀念，我們應以中華民族的觀點來團結海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同胞來共同奮鬥。唯有如此，民族的利益才能保存。在歷史上我們雖然把蒙古族和滿族列入主中國視爲異族，可是今天是五族共和的時代。我們常常談民族英雄岳飛和文天祥的事跡，我們今天更需要新的民族英雄來爲中華民族盡忠盡孝，這

一點我認爲非常重要。

其次關於中蘇共之間的會談，美國的學者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表示悲觀，認爲中共目前採等距外交，和蘇聯進行談判，使美國的聯中共制蘇俄的策略無法實現。另外一派的學者認爲，北平與莫斯科進行和談與和解，有助於美國的全球政策。因爲假定中共和蘇聯的談判獲得成就，使蘇聯在越南和阿富汗方面有所放鬆，無形中就等於達到了美國的目標，我們今天應當去研究美國學者的不同看法，探討出在什麼情況之下，對我們國家的前途最爲有利。美國希望和中共、日本及西歐聯合起來對抗蘇俄。假定今天中共逐漸開始向莫斯科接近，那麼在過去的四角關係中，最弱的一角就是日本。日本未來是否要加強軍備，是美國所關切的課題，其中也牽涉到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從事研究的方向。

另外李登科先生在如何加強我國對美關係活動中提出了許多點方案，我想還可以增加一點，那就是與其鼓勵我們的廠商到美國去投資，不如鼓勵華僑、美國人和歐洲國家人士到我國來投資，這樣對我們將更爲有利，一方面可以助長國內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國際間對我們的了解。

陳水逢先生：

聽了各位的寶貴意見之後，我個人認爲，我們今天來談對外關係，必須要有一個前提，也就是加強對外關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不管你是代表官方，或者代表個人，到國外出活動是一種參與，不是爲了表演，更不是爲了爭功。我很坦白講，有若干團體和個人到國外出參加某種會議，究竟他們在會議上真正發生的效果有多少，我們並不知道，可是回國前後他們往往經由中央社或報紙報導他如何進行國民外交，如何受到重視。如果誠如外電所報導的我駐外單位，民間或官方的有關人員，有這麼大的績效，我想我們的對外關係不會像今天的情況。所以我們特別要強調責任感，而不是表演或爭功。如果這一觀念能夠確立，我想我們有許多事情大家必能相輔相成，獲得更好的效果。

剛才許多位先生和女士也都提到過，我們今天的對外關係，應該有一個單位來負總責。我們無論到任何地區和任何國家，總是感覺到我們的駐外單位，好像都在彼此爭功諉過，根本不能統一。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去爭取友好的國家來打擊敵人呢？最近新聞報導中有一則消息說，國內有若干學者參加了香港的某一會議，一問之下，教育部不知情，外交部也不知道。那麼他們是怎麼出去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如果我們事先能掌握情況，能夠知道這一會議的目的，我們大家便可以好好地準備，把我們中華民國現有的各種情況，透過這種學術性的會議，有所表示；對中共可能提出的問題，也事先做好防備的工作。在這種一問三不知的情況下，我們的對外關係自然急待加強。無可諱言的，我們中華民國今天在國際上，大家都認爲已創造了經濟奇跡，難道我們在復興基地的中國人只是一個經濟動物嗎？我們在國際政治上，在其他國際性的民間活動上，我們也應當扮演積極的角色。如果我們只讓別人知道，在復興基地上的中國人，只有在經濟上有辦法，那麼其他不一無是處了嗎？今後我們應當如何

在國際政治上、對外關係上，無論其爲官方性質或者民間團體，都要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來積極的參與。舉一個個人的例子，在二、三年前，基於團結，水達被拉入國內的賽鴿協會。這是國內一個很大的團體，會員將近四萬人，其連絡處也將近有四百個，全省每一鄉鎮幾乎就有兩處；會員遍及每一角落，品流更是形形色色，其中不乏江湖兄弟、中央民意代表、公務人員，可以說非常複雜。因爲我這個人很容易被接納，也很能協調各方的意見，所以我參與了賽鴿協會，可是現在國際性的賽鴿協會，差不多有四十五個國家加入，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去年十二月召開了第十八屆賽鴿聯盟的國際會議，中華民國居然當選爲理事。有人認爲我參與賽鴿協會的活動，有點犯不着，但是我覺得只要有利於我們國家，遵照先總統 蔣公的訓示，我們要放下士大夫的心態，只要有羣衆的地方，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一定要儘量設法參與，這樣我們才會有辦法，不要有所畏縮。

還有一點誠如剛才好幾位先生都已提到的，那就是我很同意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的看法。多年來我們的對外關係太過於強調美國，多少忽略了亞洲地區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如果我們對鄰近的國家能多投入一些時間和費用，可能會有更多的朋友來幫助我們。李登科先生在他的「中華民國應如何加強對美關係」一文中，講得都很對，不過其中有一點也許很難做到，那就是應當加強和留美華人的聯繫。現在留美華人的力量是相當大的，可是坦白地講，他們現在各自爲政，不能團結，這可能與國人搞小圈子的習性有關。以色列的猶太人在美國能發生這麼大的影響，我們中國人今天在美國各地的爲數也相當可觀，爲什麼不能相輔相成，仿效美國猶太人的作法呢？這可能是中國的一個民族劣根性。國父講過，我們只有家庭和家族觀念，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如果要打破這種傳統的民族劣根性，一定要我們有關單位能開誠佈公，通力合作。對於和我們有若干距離的人士，一定要積極地爭取，不要一味以彼此有距離而把對方永遠當作敵人，先總統 蔣公講過，不是敵人，便是同志。我們要做的是如何化敵爲友。如果我們在美國能够做到這一點，由當地的學人和華人來幫助我們推展對美的各種關係，這種國內外相輔相成的作法，可能會使我們在國內用一分力量，而在美的學人與華人可能發揮兩分的力量。

最後我總感覺到，在對外關係上，各部會在擬訂有關的文化、經濟、外交政策時，應該多多邀請專家和學者參與。專家和學者也許對實務不太了解，但如果將實際情況告訴他們，以他們的智慧和理論，可以幫助設計、分析。對推展對外關係，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葛敦華先生：

剛才聽到孫副主任委員講到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有逐漸移向亞太地區的可能與趨向，使我想到經濟發展與船運有密切的關係。尤其亞太地區的貨運大部份要靠海上運輸，一部份靠航空運輸；而航空運輸量的增加，又需要更多的油料供應，因此油船也相形增多。現在每天平均行駛在大西洋的船隻平均有二千艘，太平洋約八千艘。當然太平洋水域的面積要比大西洋來得大，但只有兩倍而已，而航行船隻數目則大四倍，很顯然的太平洋的船運往返比大西洋更爲頻繁。而現在載運旅客的船隻爲數極少，所以船



隻運輸以貨運為主，概略地說，一萬至二萬噸的小船，可裝一至二百個貨櫃，也有一些散貨與貨櫃兩用的船隻，每一艘的航運費約一百萬美元，而收入則在三百萬美元。貨物托運時每一大型貨櫃的租費約五千元，所以每條船航行一次托運者大約要化費一百萬美元。貨運的貿易量，平均佔全世界貿易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每條船的運費為一百萬時，貨物的價值則為一千萬，所以太平洋上的八千艘貨運船隻，其貿易量之大可想而知。從這一方面來看，亞太地區的貿易量非常大。全世界有二百三十個貨櫃輪港口，高雄的貨櫃進出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將來很可能超越休士頓而躍居世界第一，基隆港位居第五位。所以從貨櫃船隻運輸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亞太地區，特別是我們中華民國，貨運的數字是相當可觀的。

李本京先生：

剛才許多位先進都談到亞洲地位的重要性，大家討論到亞洲的地位比歐洲來得重要，我想這個日子的來臨恐怕還非常遙遠。目前由於我們身為亞洲人，常常在討論究竟亞洲重要、還是歐洲重要的時候，難免會作情緒上的誇大。歐洲在經濟和貿易上的重要性逐漸稍退，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推出了各種新穎的貨品以及日本對美國的經濟壓力，所以大家覺得世界經濟重心有向亞洲東移的傾向。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因為亞洲人力充沛、資源豐富。但事實上從今天的政治氣候來看，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仍然是重歐輕亞的。如果我們認為今天是亞洲在政治上比較重要，那是由於從歐洲的重要性延伸而來。假如今天美國認為亞洲重要，那是一種以歐洲為主而以亞洲為從的關係。包威爾 (George Ball) 講過，世界上有三個半勢力，美國、西歐、蘇聯外加半個是日本。他在六〇年代講的這句話，現在確實已經實現了。在他的心目中，亞洲只有日本這半個勢力。這種看法充分代表了美國在政治上的看法。這是我提出來就教於各位先進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向陳鴻瑜先生請教兩點，第一點是你在報告中提到印度在一九七〇年代，在某種程度來講是屬於蘇聯領導下的鬆散國家集團。我想在某種戰略上的考慮，由於美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使得印度在軍事上向蘇聯購買武器，在外交上也比較親蘇；可是如果把印度和外蒙、阿富汗列為一體，置於以蘇聯為首的鬆散國家集團，我想從一九七〇年代的變化來看，未免言之過早。因為在七〇年代開始時可能有這種現象，到了八〇年代，這種現象就可能有點沖淡了，這是我一點淺見，特別向陳先生請教。另一點就是陳先生提到，在美國、中共、日本的三角關係中，中共是個「不確定的變項」。我們與其說中共是個不確定的變項，不如說在這個三角關係中，真正不確定的變項不在這三個勢力之中，而事實上是美國與蘇聯的關係，也就是說美蘇關係可能影響到美、日、中(共)的三角關係，而這個三角關係是死的，而美蘇關係是活的。這是我的一種比較 Radical 的想法，不是很 Conventional 的。這一點也請陳先生指教。另外，我記得在一九七七年范錫在 Asian Society 講過一句，他說美國只是一個太平洋的經濟國家、文化國家、地理國家，但是沒有說美國是太平洋的軍事國家、政治國家。這篇演說是在卡特總統剛上任不久，由國務卿所發表的第一篇亞洲政策的重要文獻，其所代表的不僅是卡特和范錫兩人的哲學，可能一脈相傳，現在的雷根總統也繼承了這種思想。從這裡可以看出美國對亞洲重視的程度，值得大家注意。

最後談到我們如何在外交上因應的問題，我想最重要的要看我們如何來研究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國家。蘇聯有一個有名的研究機構叫「美國與加拿大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U. S. and Canada)，其中工作人員約有二千人左右，光是研究人員就有三百五十至五百人，這麼大的一個機構在政府支持下，只研究美國和加拿大；而反過來看美國如何研究蘇聯呢？美國研究蘇聯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政府擬出若干研究計劃，委託一些私人的機構或公司來研究，如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第二個方法是透過大學所設之蘇聯及遠東研究所等來作研究。就蘭德公司來講，研究中共問題的研究員有四位，研究蘇聯的有廿五至廿七位。這只是研究員的數目，尚不包括助理研究人員。蘇聯和美國以這麼多的人力和這麼大的機構來研究對方，當然會很有成就。至於談到如何訓練外交官的問題，我覺得我們今天訓練外交官的方法，仍和卅年前一樣，是通才的訓練。今天派往法國，過後又可派到北美工作，再過幾年又派往日本。這種通才式的教育，日前用處有限。今後訓練的方向應專才化，也就是研究某一地區的人，就派往該地區去工作。在這種改變之前，各大學應設地區研究課程，外交官考試時也要增加地區研究的課目。

陳鴻瑜答覆：

剛才李本京教授提出兩點批評，我現在答覆一下。第一點就是印度究竟應放在那一個集團，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從印度的外交政策來了解。印度在外交政策上一向標榜不結盟，我之所以把它歸類到蘇聯集團，那是因為印度在美蘇兩大集團中比較偏向蘇聯，印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與蘇聯簽訂了「和平友好合作條約」，而且在中南半島問題上，直至目前一直是支持越南及橫山林政權，根據這種關係，我把印度列入蘇聯為首的集團之中。第二個問題是李教授認為「美、中(共)、日三角關係中，中共是個不確定的變項」，這句話應改為「美蘇關係」是個不確定的變項。我想這是語意上的問題。在本段文字上我是講美國、中共和日本三者之間的關係中，中共是一個不確定的變項。當然，「美蘇關係」也可以說是一個變項，不過，這已不是本段文字所欲表達的主題了。

沈劍虹先生：

我們今天的討論都是圍繞著問題的四週在轉，似乎沒有談到問題的核心。今天所討論的實際上只是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的亞太政策及我們如何因應的問題。美國的亞太政策乃是它全球政策的一環。美國的亞太政策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儘管它有主觀的成份，可是大部份還是要看國際的環境以及美國所要追求的目標而定。提到重歐輕亞或重亞輕歐的問題，我們可以提出種種數字，來證實亞太地區一天比一天重要；但從歷史、血緣、地理、文化，甚至於宗教等各種關係來看，美國不可能重亞輕歐的，至少在未來若干年內，美國的這種政策，不可能會有基本性的變化。近十年來，美國政策上如果有什麼重要的變化的話，主要的也是美蘇兩國力量消長的問題。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由於缺乏遠見，解除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使其在與蘇聯的軍力對比上，居於下風。特別是蘇聯在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中，在軍事上的力量，直接趕上、甚至超越美國。這是一個基本的國際因素，我們討論任何國際問題時都必須牢記在心。在過去十幾年中，美蘇冷戰從相持不下而突然發生中蘇共交惡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發生

固然有它本身的原因，並不是美國所引起的，也不是美國所能控制的，可是美國却要加以運用，一方面以抵銷蘇聯的壓力，一方面使於美國以越戰越南化的名義從亞洲退出。中共之所以樂意接受美國的和解建議，是因為從布里斯望夫提出「有限主權說」，出兵捷克之後，中共惶惶然不可終日。我記得當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後，每一個訪問過中國大陸的美國人回來後都說，中共只有興趣談一件事，那就是蘇聯擴張的問題，別的問題都是次要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尼克森和周恩來在外交上是一拍即合，於是造成了今天的局勢。大致而言，這種基本情勢還沒有變。雖然美國一度在北平打得火熱，現在好像有逐漸冷卻的模樣，可是要互相利用的基本因素沒有改變。現在雷根總統當家，雖然不再強調美國與中共間有戰略上的平行利益，但是美國始終認為和中共維持目前的關係，是對美國有利的這一基本情勢，我看短期間不可能有戲劇化的改變。

至於美國對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政策，我想更是美國歷年來所推行的政策的延續：對澳紐來說，有ANZUS Pact；對日韓而言，有安保條約，對菲律賓而言，有雙邊協定與海空軍基地。直到現在，美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都沒有任何變動，唯一變動的是美國對中華民國的關係。美國之所以要改變對中華民國的關係，就美國而言，有其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否則的話，美國和中共就沒法子搭線。中共在尼克森訪問之前，爲了聯合公報問題，跟美方爭論了很久，爭論點之一就是中國（China）這個問題。周恩來堅持要用「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但終於同意季辛吉所提的「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季辛吉自己認爲已經很高明了，只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不說是那一個中國。也就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在這種Agree to disagree的情況，下完成了上海公報。去年「八一七公報」所提的還是過去的一套，沒有任何的改變。美國只說認知（Acknowledge）中共的立場，始終沒有說「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換句話說，美國並不承認中共對臺灣擁有主權，這一點美國是始終保留著的。至於今後我們應如何的做法，問題很大。李登科先生剛才提出十點建議，我想他恐怕對實際外交業務的操作不十分了解，其內容也沒有獨到而新奇的地方，可以說仍然是一些老生常談。我想我們今天所能做的並不多，其一就如剛才邵玉銘先生說的，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去批評和指責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如何發展，而要把大部份的精力去講我們的情況。這樣做至少會使美方聽的人比較容易接受，而且也不會責怪我們一味的存心破壞他們與中共的關係。雖然美國與中共的蜜月已過，但是雙方的關係仍舊存在。第二、我們應該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去做，不要好高騖遠，剛才有一位先生提到應該花一部份錢在美國各地遍設中華民國友好協會。事實上這項工作在我任內早就開始了。「自由中國協會」（Free China Association）的組織，到現在爲止，在全美各地大概設有八十幾個分會。另外有人提議我們應該多請些對我們不太友好的所謂自由派的份子來我國訪問，事實上我們也都在做。麥高文這次來華訪問，我第一天看到他就告訴他說：「我十年前就曾向你邀請過，你等了十年到今天才來」。後來我看到某一報紙在小評中說，我們邀請這批人的方法大概不太對，因爲麥高文這次來訪是透過華府一位華人餐館老闆的建議而成行的，以後我們不要用官方出面來邀請。其實當初我們和美國還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不用大使的名義去請他，那用誰的名義去請呢？所以情況往往

有許多隔閡，問題又沒有搔到癢處。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做的事很多，但是要少說多做，一步一步去做。我認為現在政府在做的，方向大致都很對，也許方法上還需要研究，還需要加強。也許政府有關部門很怕別人來惹事生非，我希望這種態度能夠逐漸減少，如果有什麼人能幫得上忙的，有路子可以走的，有線可以拉的，儘管讓他們去試試，事情成了個人不必居功，有關部會也不必居功，而是應該歸功於大家。我想今天這個座談會很有意義，而中心以外的先生和女士們的意見也很有價值。至於各位中有人建議充實外交實際研究等等，我覺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對這一類的工作都可以做，而外交部可能限於經費，也由於科班出身的外交官並不是專門研究問題的人，如果一定要某人做一篇專案研究，恐怕是強其所難，倒不如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多承擔一些外交部委託的研究工作。

陳元先生：

美國和亞太地區的經濟關係包括三方面：(1)貿易；(2)原料來源和(3)投資。

(一)關於貿易 當前世界經濟成長率最高的部分就是亞太地區。在工業國之中，日本的實質成長率是四·四%，高於美國的二·七%，加拿大的二·六%和歐洲共同體的一·九%。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韓國、新加坡和香港是聞名世界的新興工業國和地區，在石油危機衝擊之下還能保持較高成長率，一九八一年為五·五%，一九八二年為三·八%。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一九八一年平均為六·九%。至於澳洲和紐西蘭則是豐富天然資源出產地。換句話說，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前途最光明的地區。

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二十五個國家之中，出口方面，亞太地區佔七個，一九八一年對亞太地區出口總數共四五六億美元，佔美國同年出口總數二、三三六億的一九·六%。進口方面，一九八一年亞太地區佔六個，輸入總數為六四三億美元，佔美國同年進口總數二、六一〇億美元的二四·六%。亞太地區所佔比例的趨勢是增加的。在美國的重要貿易對手國之中，我中華民國居美國出口的第十四位，進口的第八位。

美國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亞布列奇與一九八二年十月向國會參院小組委員會報告說：「……東南亞國家協會國家是美國進口的重要供給國。在一九八〇年，美國所進口天然橡膠的八九%、錫的六五%、原油的二八%、硬木的二八%、棕櫚油的九五%是來自東協五國。美國所需要的鉍、鋰、和鎢等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稀有金屬，東協各國也是主要的供給者。」

至於澳洲與紐西蘭和美國之間已訂有「美、澳、紐同盟」，曾和美國舉行聯合演習，歡迎美國艦隊訪問。澳洲還和美國共同營運幾個電子裝置。澳洲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其重要性，對美國而言，僅次於加拿大。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至十八日，東協五國和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共同體、澳洲和紐西蘭開會，同時開「五加六」的會議，也舉行「五加一」的會議（東協和個別工業國的會議）。同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美國又和澳洲與紐西蘭在坎培拉開會。亞布列奇指出：「我們參加這兩個會議大大的推動了美國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政策所定的目標。這兩次會議，尤其是『五加六』的

會議，不但表示了美國的，也表示了西歐和日本對這一地區的政策<sup>①</sup>。

(二)關於原料來源 美國在工業國中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更因為和加拿大毗隣，輸入原料更為方便。但是還有大量要由亞太地區供給。一九七七年由亞太地區輸入的七種原料如下表<sup>②</sup>：

鐵砂(長噸)	三〇五·二	銅礦(千磅)	四七、八一九·七
鉛	三六、五七七·九	鋅礦(千磅)	四〇、〇六三·六
鐵礬土(千長噸)	二、一二三·五	煤與焦(千短噸)	一五五·六
石油(千桶)	二一五、五九三·二		

### (三)美國的投资

截至一九八一年底，美國私人直接對資帳價值為二、二七三億美元<sup>③</sup>。根據亞布列奇的報告，美國對東協五國的投资，包括美國石油公司對印尼和馬來西亞石油與瓦斯勘探和開發的支出，在一九八二年冬季止，約達一百億美元<sup>④</sup>。

沈劍虹先生：

就「反共」這兩個字來說，據我的了解，美國的對外政策不是基於意識型態，美國的反蘇是爲了阻止蘇聯對外擴張，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爲什麼美國現在要拉攏中共，所以 Ideology 在今天美國對外政策中所佔的成份，我想是微乎其微的。

### 八、主席結論：

座談會的主席，似乎都要作一個結論。各位的意見都非常寶貴，而且是從多種角度來看各種不同的問題，所以要想作一個結論實在不太容易。如果再重覆各位的論點，恐怕也嫌浪費時間。不過我想下列幾點應是今天與會的先生和女士們的共同看法。

(一)世界經濟重心已轉向亞太地區。世界經濟的重心在歷史上曾數度轉移：最初由地中海轉移到西歐，然後由西歐移往美國。美國戰後的GNP，誠如剛才孫副主任委員所說的，佔全世界GNP的百分之五十，而現在消退到不足百分之廿五。同時美國在

註①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 1982, pp. 27-34.

註② Yuan-li Wu, *Raw Material Supply in a Multipolar World*, National Strategy Information Center, Inc.,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9, pp. 56-61.

註③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eb. 1983, P. 281.

註④ 同註①。

亞太地區的經濟貿易，早在一九七七年就已超過了其在西歐的貿易。這些都顯示了世界經濟的重心確實是在向亞太地區轉移之中。有些美國學者甚至曾由歷史的角度指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沒落，是無法避免的事實。當然也有人持不同意的看法，但這種不可避免的論調，完全是從經濟的結構性來推斷。美國的經濟是否就那麼悲觀呢？此點似乎還值得爭論。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七〇年代以來，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率非常高，誠如孫副主任委員剛才所說的，東亞四個所謂新工業化國家及地區，在經濟發展上確實比其他新工業化國家更爲成功。

(二)美國的亞太政策有持續亦有改變。亞太地區對美國的經濟雖然愈來愈重要，但是美國是否重視亞太地區，是否仍然重歐輕亞，與會的先生和女士們的意見可能並不十分一致。有些人認爲美國很重視亞太地區，有些人則認爲美國仍然重歐輕亞。假如我們從雷根政府執政以來的言論及行爲來看，美國重視亞太地區是部份的而不是全面的；有些地方是改變了以往政府的立場，有些地方則是蕭規曹隨。譬如雷根政府與卡特政府不同，不強調人權外交。軍事安全的重要性高於人權的考慮。因此，雷根執政後，首先加強美國與大韓民國的關係，即是個典型的實例。然而美國亞太政策的基本方向並沒有改變，仍然是爲了圍堵蘇聯而拉攏中共。雖然舒茲訪問中國大陸時不談平行戰略利益，而實際上曾談及進一步加強與中共的軍事關係，因此，是在沒有平行戰略利益的口號之下，進行平行戰略利益的事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美國在有些方面確是在改變重歐輕亞的情形。譬如以往尼克森主義並不適用於歐洲而只適用於亞洲，而卡特政府所宣示的“Swing strategy”，事實上是重視了中東而忽視亞洲，在南韓撤軍也是如此。雷根政府執政後立即表示要加強美國的軍事力量建立三洋海軍，增強美國在亞太的軍事態勢。這一點美國前國務卿海格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份曾經很自豪地說：雷根政府的新亞洲政策非常的顯著。但是不論美國的亞太政策如何的改變，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國沒有改變對中共的政策。各位在剛才也都談到，美國發展與中共的關係勢在必行，而且必然繼續加強下去。不過北平與華盛頓的關係中有一個變數，那就是中蘇兩共關係與美蘇關係。

(三)我國應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我們在美國亞太政策之中應該如何自處？許多位都同意，遠親不如近鄰，我們應該加強與亞太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透過亞太國家對美國的影響力來維護我們中美之間的關係，進而削減美國聯中共以制蘇聯的政策。

(四)加強對美關係之道，仍需進一步研究。我國應加強對美關係，但是如何加強法，大家的意見很紛雜，有待我們進一步的討論。但是與會者同意，學者的意見要與外交工作者的經驗相配合，也就是要雙方共同來研究、分析和討論。這就涉及到學術研究與工作實務雙方機構如何來進行合作的問題。

(附註：爲了配合本刊出版時間，此次國際問題座談會紀要未能分送各位發言人校閱，倘有疏漏，敬請查諒。)